

家庭决策、社会互动与劳动力流动

潘 静 陈广汉*

摘要：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面临户籍等制度约束，表现出诸如非“举家”迁移、“抱团”等独特现象。“家庭决策”和“社会互动”是解释这些独特现象的两个重要视角。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 年数据，实证探讨家庭决策机制和社会互动效应对中国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这两类因素对家庭劳动力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的作用。结果发现，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较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其劳动力外出打工率较高；村庄社会网络对家庭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家庭社会网络对劳动力省内流动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劳动力跨省流动具有正向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 家庭决策 社会互动

一、引言

在中国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日益扩大。中国劳动力的流向以从内地农村向东南沿海城市为主，劳动力流动的地域范围表现为省内就近转移和跨省异地转移并存的特征。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还表现出一些独特的社会现象。中国农村家庭往往只是部分成员外出打工，部分成员留守农村，而非“举家”迁移；外出打工成员还定期给家里汇款、寄生活费等。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以通过亲戚、同乡介绍的居多；在同一地区或单位，来自同一家乡的劳动力比例往往较大，即通常说的“抱团”现象。

怎么解释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这些独特现象？一方面，在中国农村地区，人们普遍有较强的传统家庭观念，家庭成员是否外出打工通常不是成员个体决策的结果，而是家庭通过综合权衡收益和风险后做出的家庭人力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决策结果。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受到户籍、土地等制度约束，面临异地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充分的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来自家庭和家乡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对劳动力流动和外出就业的作用尤为重要。我们需要把家庭决策机制和社会互动效应相结合才能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独特现象背后的因素进行更合理的解读。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下文简称“CFPS”)2010 年数据，实证探讨家庭决策机制和社会互动效应对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潘静，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邮政编码：510275，电子信箱：panjing21051@163.com；陈广汉，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邮政编码：510275，电子信箱：chguangh@sina.com。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珠三角劳动力市场研究”(项目编号：12BJY04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我们基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的文献研究,提出关于家庭决策和社会互动对中国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影响的研究假说。

(一) 家庭决策与劳动力流动

新古典迁移理论以个人作为劳动力迁移决策的主体,个人根据期望的城乡收入差距做出迁移的决策(Todaro,1969; Harris and Todaro,1970)。而新经济迁移理论强调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重要性,家庭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决定其成员的迁移(Stark and Levhari,1982; Stark and Taylor,1991)。对于影响家庭劳动力流动的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因素,现有的文献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绝对收入因素。现有的研究普遍发现,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劳动力流动概率越高(程名望等,2006);迁入地相对迁出地的收入水平越高,劳动力流动概率也越高(Cai and Wang,2003)。不同类型收入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又有所不同。Zhu(2002)对家庭收入做细分发现,非农就业与农业经营的收入差距越大,家庭外出打工概率越高。据此,我们推断家庭农业收入越低,劳动力流动概率会越高。Zhu(2002)所讨论的非农就业收入包括非农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而根据朱农(2004)的观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地域流动)和从事本地非农生产活动(职业流动)这两种流动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如果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本地非农经营收入越多,他们越愿意留在本地,那么,我们推断非农经营收入与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之间应该存在一种负相关关系。

第二,相对收入因素。根据新经济迁移理论,家庭在做迁移决策时不仅考虑绝对预期收入水平,而且考虑相对于参照人群的收入水平,即“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效应(Stark and Taylor,1991)。“相对剥夺”效应表明,家庭即使在家乡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只要提高的程度不及家乡的参照人群,其家庭成员仍然有一种相对剥夺的感觉,这会提高其迁移倾向。Stark和Taylor(1991)运用墨西哥迁移至美国的调查数据,证明了“相对剥夺”效应的存在。

据此,我们得到:

假说1:家庭劳动力流动概率与家庭农业收入、非农经营收入存在负相关关系,家庭劳动力流动概率与家庭相对村庄的收入水平也存在负相关关系。

第三,人力资本因素。根据第二、三产业的教育回报率较高且城市的第二、三产业相对密集的逻辑,教育在理论上能够促进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实证研究大多支持这一结论。例如,都阳和朴之水(2003)发现家庭最高教育水平对劳动力流动有积极影响;李实和Knight(2002)发现户主的教育程度与家庭劳动力流动的概率成正比。

第四,物质资本因素。土地是农村家庭最主要的物质资本。较少的人均土地数量意味着人地关系相对紧张、富余劳动力较多,而把富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有利于提高家庭的总体效益。Zhu(2002)、Chen等(2010)的研究均发现人均土地较少的家庭的劳动力流动倾向较高。

据此,我们得到:

假说2:家庭劳动力流动概率与家庭受教育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与家庭人均土地数量存在负相关关系。

(二) 社会互动与劳动力流动

根据现有文献的研究,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可划分为社会网络效应(social network effects)和同群效应(peer effects)。

对于社会网络效应,Dolfin 和 Genicot(2010)认为社会网络通过提供迁移过境信息、提供迁入地就业信息、对迁移成本的信贷担保三种机制促进迁移。Bauer 等(2002)也认为,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在不确定性环境下有利于移民获得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和信贷支持,提高预期工资,减少不确定性,并减轻融入迁入地文化的压力。现有的实证研究普遍发现社会网络能够提高迁移的可能性(Dolfin and Genicot,2010);拥有更广的亲友网络能够促进劳动力流动(Munshi,2003);异地有亲友、老乡会显著提高外出打工的概率(Chen,et al.,2010)。

在中国,村落是一个由血缘、亲缘、宗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生活共同体(李培林,2002)。在中国农村,社会网络效应的衡量也需考虑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一方面,根据中国的“拜年”文化,Bian 和 Li(2005)提出采用“拜年网”,即研究相互拜年的亲友数目及其构成来衡量社会网络。另一方面,宗族是中国传统农村人与人之间社会网络的一个缩影,人们的交往通常围绕宗族关系而展开。Hsu(1963)指出可从规模和强度来衡量宗族网络。宗族可被视为自然的合作组织,其成员自觉地与组织外成员区分开来,并共享组织资源,因此,宗族人口规模便成为对宗族网络规模的一种度量;又由于祠堂和家谱是宗族的两种表征,祠堂和家谱的存在有利于加强成员间的联系和凝聚力,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宗族网络的强度。郭云南和姚洋(2013)采用“家庭姓氏的人口比例”来衡量宗族网络规模,采用“家庭所属宗族是否有祠堂或家谱”来衡量宗族网络强度,实证研究发现宗族网络强度对家庭外出打工具有显著的影响。

据此,我们得到:

假说3:家庭劳动力流动概率与社会网络效应存在正相关关系。

对于同群效应,社会经济学分析认为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人们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来收集信息,使自己的行为趋同于他人的行为,这可使自己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获得最大效用。Bauer 等(2002)也指出“羊群效应”(herd behavior)^①体现在个体对他人迁移行为的追随,以便减少自身搜寻迁移信息的成本。Bauer 等(2002)、陆铭等(2013)均实证发现以村庄迁移率衡量的同群效应显著地提高了个体外出打工的概率。

据此,我们得到:

假说4:由于同群效应的作用,家庭劳动力流动概率与村庄劳动力流动概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 本文可能的贡献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现有的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大多只探讨与国外劳动力流动共通因素的影响,而相对缺乏针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独特现象的因素分析。本文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非“举家”迁移、“抱团”等独特现象,重点考察“家庭决策”和“社会互动”这两类因素的影响效应。第二,现有的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没有区分家庭劳动力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的情形,而本文对家庭劳动力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

三、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 CFPS2010 年数据,构建家庭和村庄两个层面的变量,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如下。

^①“羊群效应”也意指其他文献讨论的“同群效应”。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该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实施。2010年该调查的抽样对象涵盖除内蒙古、海南、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外的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3 600个成人个体、14 798个家庭和635个社区。本文使用的是CFPS2010年的农村和城中村家庭样本及其对应村庄的数据。家庭的有效样本数为9 636个,其中农村家庭样本7 368个,城中村家庭样本2 268个。村庄有效样本数为415个。本文的样本包含家庭和村庄两个层面的微观数据,该样本覆盖全国性调查的绝大部分省区,且包括大多数研究所忽略的城中村数据,本文的实证检验具有较强的普适性。

(二)变量说明

本文实证模型的自变量是劳动力流动,因变量包括家庭和村庄两个层面的特征变量,关注的变量包括反映家庭决策机制和社会互动效应的两类因素。

1. 劳动力流动的衡量

本文构建二值变量和连续变量来衡量劳动力流动,并对外出工作地是在省内和省外进行细分讨论。根据CFPS的问卷题目“过去一年(2009年),您家是否有人外出工作?”,本文构建衡量劳动力流动的二值变量,对“有家庭成员外出工作”赋值为1,对“无家庭成员外出工作”赋值为0。在9 636个家庭样本中,35.8%的家庭有成员外出工作,64.2%的家庭没有成员外出工作。我们计算家庭外出工作成员数与家庭总成员数之比,构建家庭外出工作成员比例这一连续变量。在有成员外出工作的家庭样本中,其平均人口规模为4.8人,平均外出工作率为32.2%,即这类家庭平均约有1.5人外出工作。按照家庭成员外出工作地是在本省内还是在省外,我们分别计算省内外出工作成员比例和跨省外出工作成员比例。在有成员外出工作的家庭样本中,省内外出工作成员比例均值为16.6%,跨省外出工作成员比例均值为15.6%。

2. 家庭特征变量

在家庭特征变量中,我们关注的是反映家庭决策机制和家庭社会网络效应的变量。对于家庭决策因素,本文采用家庭人均农业生产纯收入、人均非农经营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来衡量家庭绝对收入水平;采用家庭与村人均纯收入之比^①来衡量家庭相对收入水平,以此度量“相对剥夺”程度;采用家庭成员中最高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采用家庭人均经营土地面积来衡量物质资本水平。以上变量中,家庭人均农业收入、家庭人均非农经营收入、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家庭人均经营土地面积分别取对数处理^②后再纳入实证模型中。对于家庭社会网络,本文采用春节期间来拜访的亲戚家数目、家族是否有族谱/家谱来衡量。现有的文献普遍认为:拜年的亲戚越多,则家庭社会网络规模越大(Bian and Li, 2005);相对于没有族谱/家谱的家庭,有族谱/家谱的家庭的网络联系更紧密,家庭社会网络强度更高(Tsai, 2007)。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还包括家庭是否从事农业生产、是否经历过土地被征用。

3. 村庄特征变量

在村庄特征变量中,我们关注的是反映村庄社会网络 and 同群效应的变量。对于村庄社会网络,本文采用村内家族祠堂数、最大姓氏户数占全村总户数比例来衡量。村内有较多的家族

^①家庭年人均纯收入源于CFPS中家庭调查的数据,村年人均纯收入数据源于CFPS中村委会报告的数据,两者在调查上相对独立,可尽量避免两者之间的内生性。

^②家庭人均农业收入、家庭人均非农经营收入、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家庭人均经营土地面积这几个变量存在等于0的观测值,对此,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加一个很小正数(0.0001)后再取对数。

祠堂,村内家族间在祠堂开展的集体仪式或交流活动一般较多,这有利于加强相互间的责任意识或网络凝聚力,提高村庄社会网络资本(Tsai,2007);相同姓氏家族内部的认同感和网络联系一般较强,当村最大姓氏户数所占比例较高时,同姓氏家族辐射至村内的网络联系也较强,村庄社会网络强度因而也较高(Freedman,1965)。对于同群效应,我们采用村外出打工比例这一变量来检验。如果村外出打工比例的系数显著为正值,那么说明村劳动力流动概率越高,家庭劳动力流动概率也越高,证明存在同群效应。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还包括村人均纯收入、村人均农业总产值、村是否有集体企业、村常住人口数、村距县城(市区)的距离、村是否为少数民族聚集区、村是否属于城中村。其中,村人均纯收入、村人均农业总产值^①、村常住人口数这几个变量取对数处理后再纳入实证模型中。

变量说明和描述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说明和描述统计

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全样本 (9 636)				有人外出工 作家庭样本 (3 450)	无人外出工 作家庭样本 (6 186)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平均值
因变量	家庭是否有人外出工作	家庭是否有人外出工作: “有”=1,“无”=0	0.358	0.479	0	1	1	0
	家庭外出工作成员比例	家庭外出工作成员数与家庭总成员数之比(%)	11.53	18.64	0	100	32.20	0
	省内外外出工作成员比例	家庭外出到省内工作的成员数与家庭总成员数之比(%)	5.93	14.38	0	100	16.56	0
	跨省外出工作成员比例	家庭到外省工作的成员数与家庭总成员数之比(%)	5.60	13.52	0	100	15.64	0
家庭特征变量	人均农业收入 [#]	家庭年人均农业生产纯收入(元)	1 426	3 445	0	175 063	1 314	1 488
	人均非农经营收入 [#]	家庭年人均非农经营收入(元)	151	4 359	0	375 000	83	189
	人均工资性收入 [#]	家庭年人均工资性收入(元)	4 239	6 381	0	160 000	4 191	4 265
	家庭与村人均纯收入之比	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与村年人均纯收入之比	0.94	3.87	0	244	0.98	0.91
	教育程度	家庭成员中最高受教育程度: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博士,依次取值1~8	3.01	1.21	1	7	3.20	2.91
	人均经营土地面积 [#]	家庭人均经营土地面积(亩)	1.91	7.98	0	502	1.91	1.91
	拜年亲戚家数	春节期间来拜访的亲戚家的数目	6.04	6.83	0	100	6.45	5.81
	有族谱/家谱	家族是否有族谱/家谱: “是”=1,“否”=0	0.24	0.43	0	1	0.26	0.23
	从事农业生产	家庭是否从事农业生产: “是”=1,“否”=0	0.75	0.43	0	1	0.84	0.70
	土地被征用	家庭是否经历过土地被征用: “是”=1,“否”=0	0.12	0.33	0	1	0.10	0.14

^①村人均农业总产值存在等于0的观测值,对此,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加一个很小正数(0.0001)后再取对数。

续表 1 变量说明和描述统计

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全样本 (9 636)				有人外出工 作家庭样本 (3 450)	无人外出工 作家庭样本 (6 186)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平均值
村庄特征变量	祠堂数	村内家族祠堂数(个)	0.49	2.02	0	22	0.65	0.40
	最大姓氏户数比例	最大姓氏户数占全村总户数的比例(%)	32.28	28.56	0	100	35.43	30.54
	村外出打工比例	村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占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	33.05	22.27	0	100	37.68	30.48
	村人均纯收入 [#]	村年人均纯收入(元)	3 873	2 463	53	28 000	2 951	4 385
	村人均农业总产值 [#]	村年人均农业总产值(元)	5 209	26 371	0	473 226	3 251	6 296
	村有集体企业	村是否有集体企业:“有”=1,“无”=0	0.05	0.22	0	1	0.03	0.07
	常住人口数 [#]	村常住人口数(人)	2 073	1 523	31	10 982	2 030	2 097
	距县城距离	村距本县县城(市区)的距离(公里)	27.89	22.04	0	130	29.39	27.05
	少数民族聚集区	村是否为少数民族聚集区:“是”=1,“否”=0	0.12	0.33	0	1	0.13	0.12
	城中村	是否属于城中村:“是”=1,“否”=0	0.24	0.42	0	1	0.16	0.28

注: #表示该变量以对数形式纳入模型中。

四、实证模型与结果分析

本文的基本模型对影响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家庭决策机制和社会互动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考察这两类因素对家庭劳动力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的影响。对于因变量中衡量劳动力流动的变量是二值变量的情形,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对于因变量中衡量劳动力流动的变量是连续变量的情形,现有的文献通常采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然而,当因变量取值受限制或存在选择性时,若直接采用 OLS 估计一般会导致估计参数有偏且不一致^①。此时,采用 Tobit 模型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个问题。本文衡量劳动力流动的连续变量“家庭外出工作成员比例”、“家庭省内外外出工作成员比例”、“家庭跨省外出工作成员比例”有较大比例样本点取值为 0,数据存在“左截断”(left - censored)结构。对此,我们采用“左截断”数据形式的 Tobit 模型,并运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

(一)基本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 2 是基本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 1 是以家庭是否有人外出工作这一二值变量作为因变量,采用 Probit 模型估计的结果。模型 2、3 是以家庭外出工作成员比例作为因变量,分别采用 Tobit 模型和 OLS 估计的结果。从模型 2 和 3 的比较中发现,对于本文样本,Tobit 模型和 OLS 估计的变量系数符号基本一致,稳健性较强;Tobit 模型估计的边际效应与 OLS 估计的系数^②稍有差异,下文我们主要采用 Tobit 模型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①OLS 估计只有在如下两种特殊情形下得到的估计参数是无偏的:(1)选择方程和结果方程的扰动项不相关,即选择过程和结果过程相互独立;(2)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与结果方程中的因变量不相关。

②Tobit 模型的变量系数不能直接解释为边际效应,需要进行调整;OLS 模型的变量系数可解释为边际效应。

1. 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因素的影响

在模型1、2中,家庭人均农业收入、家庭人均非农经营收入的系数都显著为负值,这说明家庭人均农业收入、人均非农经营收入越低,家庭有人外出工作的概率(下文简称“家庭外出打工率”)越高。这印证了假说1中的“家庭劳动力流动概率与家庭农业收入以及非农经营收入存在负相关关系”。另外,模型1、2表明家庭劳动力流动概率与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工资性收入有一部分是由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挣得的,所以人均工资性收入高的家庭,其劳动力流动的概率也高。

在模型1、2中,在控制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和村庄人均收入水平的变量后,家庭与村人均纯收入之比的系数显著为负值,这表明在相同的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和村庄人均收入水平下,相对于村庄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其外出打工倾向越大。家庭与村人均纯收入之比每下降10%,家庭外出打工率将提高0.04%,家庭外出工作成员比例将提高1.14%。这印证了假说1中的“家庭劳动力流动概率与家庭相对村庄的收入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也证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相对剥夺”效应。

2.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因素的影响

在模型1、2中,家庭成员中最高教育程度的系数显著为正值,这说明家庭成员教育程度的提高不仅提高了家庭外出打工率,也提高了家庭外出工作成员比例。模型1中,家庭人均经营土地面积的系数为负值,这说明家庭人均经营土地面积与家庭外出打工率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但不太显著。模型2中,家庭人均经营土地面积的系数显著为负值,这说明家庭人均经营土地面积越小,家庭外出工作的成员比例越高。这支持了假说2,即家庭劳动力流动概率与家庭受教育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与家庭人均土地数量存在负相关关系。

3. 社会网络效应的影响

本文讨论的社会网络效应划分为家庭和村庄两个层面。对于家庭社会网络效应,无论是以拜年亲戚家数还是以家庭是否有族谱/家谱来衡量,这两个变量系数都不显著,这暂未能说明家庭社会网络对总体上的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影响。下文拟划分劳动力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的情况做进一步分析。对于村庄社会网络效应,在模型1、2中,无论是以村庄祠堂数还是以最大姓氏户数比例衡量村庄社会网络,其变量系数都显著为正值。村庄祠堂数越多,最大姓氏户数比例越高,则家庭外出打工率和家庭外出工作成员比例越高。这说明村庄社会网络对家庭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从村庄社会网络层面印证了假说3中关于社会网络效应与家庭劳动力流动概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4. 同群效应的影响

在模型1、2中,村外出打工比例的系数显著为正值。村外出打工比例每提高10%,家庭外出打工率将提高0.03%,家庭外出工作成员比例将提高0.93%。这说明家庭劳动力流动概率与村庄劳动力流动概率之间具有同向变化趋势,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同群效应,这支持了假说4的结论。

此外,模型1、2中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的外出打工率和外出工作成员比例都显著高于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经历过土地被征用的家庭的外出打工率和外出工作成员比例都显著低于没有经历过土地被征用的家庭;人均纯收入较低的村庄,其家庭外出打工率和外出工作成员比例都显著较高;村人均农业生产总值较高的村庄,其家庭外出打工率和外出工作成员比例都显著较高;有集体企业的村庄的家庭劳动力流动概率比没有集体企业的村庄要低;村常住人口数越多,家庭劳动力流动概率越高;村离县城的距离越远,家庭劳动力流动概率越高;城中村的家庭劳动力流动概率较低;是否属于少数民族集聚区对家庭劳动力流动没有显著影响。

表 2 基本模型的估计结果

类别	变量名称	模型 1: Probit 模型 家庭是否有人外出工作		模型 2: Tobit 模型 家庭外出工作成员比例		模型 3: OLS 模型 家庭外出工作成员比例
		系数 (标准差)	边际效应	系数 (标准差)	边际效应	系数 (标准差)
家庭特征变量	人均农业收入 [#]	-0.0114 ** (0.005)	-0.0041	-0.3230 * (0.183)	-0.0959	-0.0811 (0.069)
	人均非农经营收入 [#]	-0.0218 ** (0.009)	-0.0079	-0.8537 *** (0.321)	-0.2534	-0.2904 *** (0.105)
	人均工资性收入 [#]	0.0520 *** (0.002)	0.1889	2.1687 *** (0.093)	0.6437	0.5617 *** (0.027)
	家庭与村人均纯收入之比	-0.0100 *** (0.003)	-0.0036	-0.3827 *** (0.127)	-0.1136	-0.1198 ** (0.051)
	教育程度	0.1054 *** (0.013)	0.0383	4.0968 *** (0.456)	1.2160	1.2132 *** (0.163)
	人均经营土地面积 [#]	-0.0100 (0.008)	-0.0036	-0.4664 * (0.276)	-0.1384	-0.1362 (0.102)
	拜年亲戚家数	0.0032 (0.002)	0.0011	0.0667 (0.074)	0.0198	0.0086 (0.027)
	有族谱/家谱	-0.0121 (0.034)	-0.0044	-0.1730 (1.195)	-0.0512	0.2505 (0.438)
	从事农业生产	0.6447 *** (0.102)	0.2124	19.3041 *** (3.611)	5.7296	3.8575 *** (1.339)
	土地被征用	-0.1687 *** (0.047)	-0.0594	-6.1738 *** (1.673)	-1.8325	-1.8348 *** (0.583)
村庄特征变量	祠堂数	0.0300 *** (0.007)	0.0109	0.7259 *** (0.242)	0.2154	0.2658 *** (0.094)
	最大姓氏户数比例	0.0020 *** (0.001)	0.0007	0.0643 *** (0.019)	0.0191	0.0202 *** (0.007)
	村外出打工比例	0.0082 *** (0.001)	0.0030	0.3133 *** (0.024)	0.0930	0.1022 *** (0.009)
	村人均纯收入 [#]	-0.2186 *** (0.019)	-0.0794	-7.6591 *** (0.676)	-2.2733	-2.2458 *** (0.242)
	村人均农业总产值 [#]	0.0157 *** (0.006)	0.0057	0.5123 ** (0.204)	0.1521	0.0877 (0.065)
	村有集体企业	-0.2640 *** (0.080)	-0.0902	-9.3886 *** (2.899)	-2.7866	-2.5892 *** (0.928)
	常住人口数 [#]	0.0630 *** (0.021)	0.0229	2.2559 *** (0.745)	0.6696	0.6171 ** (0.261)
	距县城距离	0.0030 *** (0.001)	0.0011	0.0972 *** (0.024)	0.0289	0.0262 *** (0.009)
	少数民族聚集区	-0.0451 (0.047)	-0.0163	-0.1731 (1.667)	-0.0514	-0.2271 (0.617)
	城中村	-0.2941 *** (0.040)	-0.1025	-10.8641 *** (1.449)	-3.2246	-3.3420 *** (0.498)
常数项		-0.8401 *** (0.239)		-32.6971 *** (8.589)		8.5605 *** (3.061)
观测值		9 087		9 087		9 087
虚拟 R ² 或调整 R ²		0.1265		0.0394		0.1082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 表示该变量以对数形式纳入模型中。

(二) 进一步考察

为进一步考察劳动力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的影响因素, 我们分别对家庭劳动力省内流动

和跨省流动的比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4、6分别是以家庭省内外出工作成员比例、家庭跨省外出工作成员比例作为因变量采用Tobit模型估计的结果;模型5、7是相应采用OLS估计的结果。

表3 劳动力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的估计结果

类别	变量名称	模型 4:Tobit 模型 家庭省内外出 工作成员比例		模型 5:OLS 模型 家庭省内外出 工作成员比例		模型 6:Tobit 模型 家庭跨省外出 工作成员比例		模型 7:OLS 模型 家庭跨省外出 工作成员比例	
		系数 (标准差)	边际效应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边际效应	系数 (标准差)		
家庭特征变量	人均农业收入 [#]	-0.7259*** (0.261)	-0.1524	-0.1318** (0.055)	0.3116 (0.276)	0.0652	0.0507 (0.052)		
	人均非农经营收入 [#]	-1.8994*** (0.599)	-0.3987	-0.2494*** (0.083)	-0.1157 (0.423)	-0.0242	-0.0411 (0.079)		
	人均工资性收入 [#]	2.2902*** (0.149)	0.4807	0.2935*** (0.021)	1.9238*** (0.133)	0.4028	0.2683*** (0.020)		
	家庭与村人均纯收入之比	-0.9920*** (0.373)	-0.2082	-0.0586 (0.040)	-0.3919** (0.159)	-0.0821	-0.0612 (0.038)		
	教育程度	5.9895*** (0.675)	1.2572	0.8698*** (0.130)	2.5839*** (0.648)	0.5410	0.3434*** (0.123)		
	人均经营土地面积 [#]	-0.1922 (0.413)	-0.0403	-0.0421 (0.081)	-0.6460* (0.384)	-0.1353	-0.0941 (0.077)		
	拜年亲戚家数	-0.2607** (0.115)	-0.0547	-0.0733*** (0.022)	0.3725*** (0.099)	0.0780	0.0820*** (0.021)		
	有族谱/家谱	0.5956 (1.757)	0.1250	0.2889 (0.348)	-1.0611 (1.696)	-0.2222	-0.0384 (0.329)		
	从事农业生产	23.5322*** (5.245)	4.9391	3.1201*** (1.063)	12.5490** (5.302)	2.6276	0.7374 (1.005)		
	土地被征用	-5.1467** (2.464)	-1.0803	-0.9476** (0.462)	-5.9751** (2.422)	-1.2511	-0.8873** (0.437)		
村庄特征变量	祠堂数	1.4007*** (0.341)	0.2940	0.3073*** (0.075)	-0.2123 (0.357)	0.0445	-0.0415 (0.071)		
	最大姓氏户数比例	0.0717*** (0.028)	0.0151	0.0112** (0.005)	0.0475* (0.027)	0.0100	0.0090* (0.005)		
	村外出打工比例	0.1925*** (0.036)	0.0404	0.0339*** (0.007)	0.3899*** (0.035)	0.0816	0.0683*** (0.006)		
	村人均纯收入 [#]	-4.9731*** (1.025)	-1.0438	-0.6208*** (0.192)	-10.2413*** (0.969)	-2.1443	-1.6250*** (0.182)		
	村人均农业总产值 [#]	0.5381* (0.300)	0.1129	0.0530 (0.052)	0.5155* (0.302)	0.1079	0.0347 (0.049)		
	村有集体企业	-15.4408*** (4.484)	-3.2409	-2.2959*** (0.736)	-2.8886 (4.190)	-0.6048	-0.2933 (0.696)		
	常住人口数 [#]	2.9850*** (1.102)	0.6265	0.3997* (0.207)	1.4170 (1.063)	0.2967	0.2174 (0.196)		
	距县城距离	0.0713** (0.036)	0.0150	0.0123* (0.007)	0.1068*** (0.033)	0.0224	0.0139** (0.007)		
	少数民族聚集区	-1.4071 (2.498)	-0.2953	-0.5536 (0.490)	1.7544 (2.313)	0.3673	0.3265 (0.463)		
	城中村	-9.7848*** (2.122)	-2.0537	-1.5795*** (0.395)	-12.0562*** (2.148)	-2.5244	-1.7625*** (0.373)		
常数项		-101.7010*** (13.457)		-1.7013 (2.429)		-24.4800** (12.164)		10.2619*** (2.297)	
观测值		9 087		9 087		9 087		9 087	
虚拟 R ² 或调整 R ²		0.0308		0.0476		0.0349		0.0588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表示该变量以对数形式纳入模型中。

1. 家庭决策因素对劳动力省内和跨省流动的影响

模型4、6表明,绝对收入因素中的家庭人均农业收入和人均非农经营收入对劳动力省内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基本模型的结果一致;但这两个变量对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对劳动力省内和跨省流动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基本模型一致,家庭收入的“相对剥夺”效应无论对劳动力省内流动还是跨省流动的影响都显著。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劳动力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家庭人均经营土地数量对劳动力省内流动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劳动力跨省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2. 社会互动因素对劳动力省内和跨省流动的影响

对于社会网络效应,模型4、6表明,以拜年亲戚家数衡量,家庭社会网络对劳动力省内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劳动力跨省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拜年亲戚家数较多的家庭,其家庭社会网络联系较紧密,家庭成员对家乡的归属感较强,且家庭社会网络在家乡当地能对家庭成员就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他们更愿意留在本地工作;而在当前中国存在制约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约束下,家庭成员如果到省外打工,则面临比在省内打工更高的心理成本、家庭赡养成本和就业风险,需要拥有更强的家庭社会网络才能弥补家庭成员省外打工的成本,并减轻其给家庭带来的风险负担,因而家庭社会网络越强,劳动力跨省流动概率越高。此外,以村最大姓氏户数比例衡量的村庄社会网络对劳动力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都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以祠堂数衡量的村庄社会网络对劳动力省内流动的促进效应显著,但对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

对于同群效应,模型4、6表明家庭省内外出打工成员比例、跨省外出打工成员比例分别与村外出打工比例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劳动力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都存在同群效应。此外,模型其他控制变量对劳动力省内、跨省流动的影响与基本模型的结果基本一致。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面临户籍等制度约束、存在诸如非“举家”迁移和“抱团”等独特现象,从“家庭决策”和“社会互动”的视角寻求解释。基于CFPS2010年家庭和村庄两个层面的数据,本文探讨了家庭决策机制和社会互动效应对中国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家庭人均农业收入、人均非农经营收入与家庭劳动力外出打工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相对剥夺”效应,家庭相对于村庄的相对收入越低,家庭劳动力外出打工倾向越高。第二,家庭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家庭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第三,村庄社会网络对家庭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家庭社会网络对家庭劳动力省内流动具有负向影响,对劳动力跨省流动具有正向影响。第四,家庭外出打工率与其所在村庄外出打工率呈现同向变化趋势,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同群效应”得到证实。

对此,我们得到如下的启示:

第一,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已成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较低的农业和非农经营收入所构成的农村推力因素以及城市工业化快速发展所构成的城市拉力因素是存在的,两者共同构成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源动力”。这有利于加快城市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但同时也引发如何实现城乡融合的问题。

第二,中国农村家庭在作出迁移决策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经济理性,无论是出于家庭内部分工还是进城后就业竞争力的考虑,人力资本都是影响迁移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让较高教育水平和学习能力的劳动者进城务工是大多农村家庭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乡融合,提高农村居民教育水平这个“加速度”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需要一方

面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村居民教育水平,继而提高其迁移的能力;另一方面加大对进城农民工的技能培训,继而提高其融入城市的能力。

第三,在“乡土社会”,社会互动对劳动力流动有着独特的作用,好比劳动力流动的“润滑剂”。不同于社会网络对城镇劳动力所产生的信息共享机制,社会网络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更多产生的是风险分担效应和示范效应。“抱团”迁移可尽量规避单个农民工进城所面临的风险;早批的外出打工者又会对后来外出打工者产生示范作用。但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农村所积累的“原始”社会网络如何在新迁入的城市得以拓展?这不仅需要增强村民之间的社会互动,还需要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当地工人的交流,借助“原始”社会网络建立“新型”社会网络。

第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还面临户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障碍。要克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需要通过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实施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常住人口全覆盖等政策,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程名望、史清华、徐剑侠,2006:《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经济研究》第4期。
2. 都阳、朴之水,2003:《迁移与减贫——来自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3. 郭云南、姚洋,2013:《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管理世界》第3期。
4. 李培林,2002:《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5. 李实、J. Knight,2002:《中国城市中的三种贫困类型》,《经济研究》第10期。
6. 陆铭,2011:《玻璃幕墙下的劳动力流动——制度约束、社会互动与滞后的城市化》,《南方经济》第6期。
7. 陆铭、蒋仕卿、陈钊、佐藤宏,2013:《摆脱城市化的低水平均衡——制度推动、社会互动与劳动力流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8. 朱农,2004:《离土还是离乡?——中国农村劳动力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的关系分析》,《世界经济文汇》第1期。
9. Bauer, T., G. Epstein, and I. N. Gang. 2002. "Herd Effects or Migration Networks? The Location Choice of Mexican Immigrants in the U. S. ."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551.
10. Bian, Y., and L. Li. 2005. "China's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3: A Methodological Repor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JGSS Colloquium.
11. Cai, F., and D. Wang. 2003.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 *The China Review*, 3(2): 73-93.
12. Chen, Z., S. Jiang, M. Lu, and H. Sato. 2010. "How Do Heterogeneous Social Distances Affect the Neighborhood Effect in Rural - Urban Migr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Employment Dynamics and Social Security, Fudan University.
13. Dolfin, S., and G. Genicot. 2010. "What Do Networks Do? The Role of Networks on Migration and 'Coyote' Use."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4(2): 343-359.
14. Freedman, M. 1965.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Athlone Press.
15. Harris, J. R., and M. P. Todaro. 1970.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 - Sector Analysi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1): 126-142.
16. Hsu, L. K. F. 1963. *Clan, Caste and Club*.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Company Press.
17. Munshi, K. 2003. "Networks in the Modern Economy: Mexican Migrants in the U. S. Labor Marke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2): 549-599.
18. Stark, O., and D. Levhari. 1982. "On Migration and Risk in LDC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1(1): 191-196.
19. Stark, O., and J. E. Taylor. 1991. "Migration Incentives, Migration Type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101(408): 1163-1178.
20. Todaro, M. P. 1969.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1): 138-148.
21. Tsai, L. L. 2007. "Solidary Groups, Informal Accountabilit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1(2): 355-372.

(下转第99页)

17. Brambilla, I., G. Porto, and A. Tarozzi. 2012. "Adjusting to Trade Policy: Evidence from U. S. Antidumping Duties on Vietnamese Catfish."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4(1): 304 – 319.

The Ripple Effect of US Anti – dumping Measures on China’s Industry: A Study Based on the Input – output Analysis

Xie Jianguo and Yang Tingting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U. S. anti – dumping measures on China’s related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es over the period of 1994 – 2009.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nti – dumping measures against China have caused a significant trade depression effect, especially during the first year.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argeted products have had significant ripple effects on the products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es, among which the industries of steel rolling and processing and gener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have had the greatest impact on individual domestic industries and the industries of metal products manufacturing, and both the non – ferrous metal smelting and alloy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have suffered the greatest decrease. China’s traditional export industries, domestic capital and labor intensive industries have suffered the greatest loss. Therefore, great importance should be placed on domestic sectors.

Key Words: Anti – dumping; Counterfactual; Input – output

JEL Classification: F1, L5

(责任编辑:陈永清)

(上接第 50 页)

22. Zhu, N. 2002. "The Impact of Income Gaps o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 A Verification of the Todaro Model."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2 – 3): 213 – 230.

Family Decisio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Labor Migration

Pan Jing¹ and Chen Guanghan²

(1: Lingnan College, Sun Yat – sen University;

2: The Center for Studies of Hong Kong, Macao and Pearl River Delta, Sun Yat – se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rural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faces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such as hukou and other specific problems. For example, only part of the family members migrates, but not the whole family, and migrants usually relocate and work with their relatives or villagers. To study these problems, family decis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re two important perspectives. Using the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2010, this paper tests the effects of family decis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on rural labor migration, including both the intra – province migration and inter – province migration. We draw several conclusions. First, families with lower absolute income, lower relative income and higher education, are more inclined to migrate. Second, social network with village member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migration, and social network with relatives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intra – province migration, whil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nter – province migration. Third, China’s rural labor migration shows significant peer effects.

Key Words: Labor Migration; Family Decision; Social Interaction

JEL Classification: J61, O18, R23

(责任编辑:彭爽)